

老父亲的眼睛

鱼在洋

1

省城的天气是听话的，天气预报一说有雨，它就挤出几滴眼泪。

阴沉沉的西安，在周一的早晨，下起了小雨。汽车、摩托车、公交车拥挤着。我们为给老父亲看病，也拥挤在车流中，二妹车子的玻璃上溅着雨点，雨刷划掉又落下。

西安的大医院，人多得像火车站。要上二楼，拥挤着往前走，白头发的老年人多，年龄不小的儿女扶着慢慢地往上挪。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牛，来的病人都是要擦亮“心灵的窗户”。

过道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旁边还站着等位子的。马专家让找他的助手。交上了材料，助手说，三个小时后轮到你们。

从8点半要等到11点半，漫长的等待。我们坐在椅子上，二妹一直站在门口，和一群手里同样拿着材料的人，挤在关着的门前。

窗外的雨，下得大了，打在棚子上，咚咚作响。

11点多的时候，小妹叫我，扶上老父亲，挤到了助手的办公室。助手三四十岁，戴着眼镜，很精干的样子。他先查看了老人的眼睛，对我和二妹说，人的眼睛有两个观点，一个是眼晶体，一个是眼角膜。老人的左眼没法儿治了，右眼的眼角膜也坏死了，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换个人工晶体。你们要知道，老人八十六七，年龄大了，换吧，不一定有多大作用，不要期望太高，但是，换了至少能减轻以后的疼痛。换个国产的，质量很好的。小手术，很简单，风险也是很高的，得拿定主意，愿意承担风险。

助手的打印机一阵响，打印出来十几张材料，让我签字。手术前的例行手续，我签了七八个名字，还要写与老人的关系。手续办完，助手说回去等短信，下周四的下午来做手术。

2

马专家名气超大，一周只二四做手术，找他的人排成长队。他穿着白大褂儿，查看了老父亲眼睛，劈头盖脸先训一顿。说你们来得太晚了，十年前就应该看。老人的左眼已经瞎了，右眼也马上就不好了。你们这些儿女是怎么当的？

二妹和妹夫互相看了看，没敢言语。他们从春天陪到秋天，四处跑给老人看病，尽心尽力，没法辩解。二妹说，老人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呀。

是呀，老人都是报喜不报忧，怕给子女增加麻烦，自己有了病也不说。等扛不过去，说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了。

这是西安的第四医院，据说是看眼睛最好的。那天来西安的时候，我要一起来，老父亲犟得很，硬是不准我来。他说，人太多，显得太隆重了，好像病多严重似的。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去，就好像不孝顺一样。老父亲说你要去我就不去了。

老母亲在中间当和事佬。她说你父亲比你还犟。你先不去，等做手术的时候你再来。他们就去了西安了，我一颗悬着的心，也让他们带到了省城。

那个姓马的专家，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没有在场。

专家的话是对的。父母总是眼睛很亮，看到儿女吃没吃饱，穿没穿暖。儿女总是马马虎虎的，只要老人没说有病就不太留意，忘了他们七老八十，身体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3

86岁的老父亲，曾经眼睛很亮。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显自己逞能，学唱《东方红》时，手插在兜里，老父亲扇了一耳光。他说，手要放出来，搁在胸前，要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唱，这不是开玩笑。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诗人，老了还写诗。天游式抒情诗。有的写得还不错，有意境，至少不是顺口溜。

他没有戴过眼镜，眼睛一直很好的。每天坐在公园边的高楼上，在早晨的阳光下看书读报。

去年的时候突然看不成报纸了，看什么都是亮亮的一片。到市内的几个医院看。医生说左眼不行了，右眼白内障，还可以做手术。可他们都说年龄太大，不敢做，怕有风险。

好在二妹和妹夫在西安待了好多年，也有些人脉和关系。他们拉着老人，在西安一个医院又一个医院奔走。

到了西安市第四医院，人家说可以做。又发现了老人有房颤，怕做手术的时候房颤引起问题，又是量血压，又是抽血，又是评估。跑上跑下，一回回排队，手里的相片和资料装了一袋子。

4

老父亲眼睛不好以后，老母亲就成了他的拐杖。他在丹江公园健步走，母亲当专职摄影师，拍一组照片让儿女们放心。

在商州的时候，只要家门口老地方，他自己都能走。那回老母亲去打麻将，让我陪老父亲回锦园水岸。老父亲一直不让我送，我坚持走在前面，老父亲走在后面。走出老远，回头一看，老父亲落在后面慢慢地走，脚下稳稳的。

那天晚上，依然住在二妹家。老父亲说，我动了手术，第一眼要看见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和女儿，要不就认不得了。我笑着说，就是换个人工晶体，还会认得亲人的。

老母亲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和你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你了。老父亲赶紧回话说，这一码是一码，不能胡联系。

我明白老父亲心里有点儿紧张，他是让他的儿女都在身边，给自己当后盾，心里才踏实。

再明亮的眼睛就像窗户一样，都会让岁月蒙上灰尘，得早早擦洗。不能像我们，给老父亲治眼睛太迟了。

书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的眼睛总是向下看，看到的是自己儿女的冷暖悲欢，却总是忘了向上看，留意老父亲的不愿说出的痛痒，就连眼睛快失明也没发现，愧为人子呀。

孝顺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细节都做到，难上加难。

5

周四早上，我在清冷的商州街道疾行，偌大的商洛北站，外边空荡荡，进到里面人还不少。绿皮过路火车从秦岭南坡，咿咿当当路过神城。

我和大妹摇晃在陈旧的列车上，窗外，初升的阳光让山外的草木有了几分鲜亮。

老父亲的手术安排在下午两点后，大家排队等护士叫。量血压、测眼压、备衣、备眼。一套程序一步步来，忙而不乱。备眼便是动手术的那只眼贴上白纱布。放眼望去，三四排椅子上坐着二三十个电影里的“佬罗”。

老父亲第三个进去了，不准陪人入内。老母亲一脸紧张，血压也升高了。我们姐妹四个安慰着她，心也悬着。毕竟老父亲年龄大了，风险比年轻人大多了。

二十分钟后，门打开了，护士喊父亲家属，我们赶紧过去，扶到观察室，观察一两个小时。

老父亲还清醒，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我扶着下楼时，他几乎成了盲人，左眼只有一点光感。小老汉扶着老老汉，我说平地，下楼，进电梯，他的腿脚还算听话。

又回二妹家，本来打算夜班照看。老父亲拒绝了，他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周，熟悉了方位，拿着手电，夜里自己上厕所。

我这个儿子竟酣睡一夜，没人叫，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复查，竟然取掉了纱布，父亲第一眼看到了他的四个儿女，说话也透着喜悦。他说，你们都孝顺，我高兴得很。

是呀，四个亲生儿女，有的开车，有的排队，有的搀扶，着实让人羡慕。本以为得给伤口换几次药，住上十天半月院，没料想昨天做今天就揭了纱布。测视力时，老父亲走到跟前，也看得模糊。年龄大了，恢复也慢，毕竟比不治要好。

回来的时候，阳光刺眼，二妹给老人戴上自己的墨镜。老父亲不让人扶，自己慢慢走。他知道，儿女都忙，后面的路他得自己走，慢慢适应擦亮过的“心灵的窗户”。

省城的阳光铺了一地，一个戴着墨镜的瘦削老人，正在西安一个小区慢慢向前试探着前行，身后是儿女有愧疚有祝福的目光……

话说过年

贺绪林

不觉又到了年底。一进腊月，便闻到了年味。现在和人拉起过年的话题，一不留神就说起“从前”。正应了“人过四十爱扯淡，张口就是那二年”的俗语。这也难怪，人到老年，对过年的热情已悄然减退，甚至生出些畏惧来，感叹光阴真是过得太快。

儿时，最盼过年。过年穿新衣、吃饺子、贴对联、放鞭炮、荡秋千、耍社火……尽是美事热闹事，谁能不盼？家乡过年一进腊月就拉开了序幕。喝了腊八粥，村里的锣鼓队就开始操练，铿锵铿锵地制造着喜庆气氛。哩哩啦啦到了二十三，灶王爷升天过小年；二十四挂灰杆；二十五挂粉条；二十六做豆腐；二十七杀年猪；二十八宰公鸡；二十九发面蒸馒头；大年三十除夕夜，贴春联；正月初一是春节；破五儿补穷窟窿；正月十五闹元宵，“年”才算过完。那时总觉得“年”来得太慢，走得太快。吃了元宵，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爹妈，几时又过年？每逢这时父母就相视苦笑。我不明白，过年爹妈也穿新衣、吃饺子、看社火，为啥却不大大高兴？每到年底，父亲就叹气说：“年关又到了。”母亲也跟着叹气说：“又到年关了。”

时光流逝，而今我已过了耳顺之年，不再盼过年，却“年”每年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关。现在周围的人感叹年关，可都不是因为生活困苦，而是太忙，厌烦应酬太多。我不盼过年，并不是如父辈那样贫困潦倒怕过年。现在衣食无忧，平日里也吃得起肉菜、饺子，并不在乎

稍长一点，我便明白了父母叹气的原因，置新衣、办年货、还旧债，样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而家里最缺的东西恰恰是钱，即使买一挂百字头鞭炮、半斤水果糖也要掂量掂量该不该买。他们视过年为关口，有时竟谈“年”色变。不仅父母如此，村里的乡亲们都是如此。细细想来，皆因贫穷所致。当然还没有穷困潦倒到杨白劳那步田地。

弱冠之年，依然最盼过年。每到腊月，嘴里也学着父母的口气说“年关到了”，心却喜滋滋的。那时回乡务农，一年四季都忙活，不得空闲，唯有过年生产队才放几天假。我不盼穿新衣、贴对联、放鞭炮，只因图美美吃顿饺子，好好歇歇，痛快玩玩。

时光流逝，而今我已过了耳顺之年，不再盼过年，却“年”每年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关。现在周围的人感叹年关，可都不是因为生活困苦，而是太忙，厌烦应酬太多。我不盼过年，并不是如父辈那样贫困潦倒怕过年。现在衣食无忧，平日里也吃得起肉菜、饺子，并不在乎

办年

辛恒卫

每到年前，便想起了儿时办年的情景。那时在镇安农村，办年主要是做三件事：杀年猪、磨豆腐、做年糖。

临近小年，父亲就把距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杀猪匠连师傅请来杀年猪。连师傅已年过半百，身材瘦高，面孔像霜后的大枣，黑红的脸颊打满了褶皱。但他却很有劲，再大的猪，只要他用绳一套，一拉，一拽，一揪，猪就上了案板。然后，在杀死猪的后蹄上割一小口，用那足有两米长、小拇指粗的铁棍，从割好的猪后腿小口捅进去，一推，一绞，抽出一根棍，再用嘴用力向猪蹄小口里吹气，不一会儿猪就像个猪形大气球一样四蹄朝天躺在了案板上。用沸腾腾的开水烫过猪毛，一刮，一划，一剔，猪就成了两块，砍下猪头给主人留着祭祖，剩下的砍成一条一条长条，放进大篮子里。如果谁家来买肉，不用称，要几斤切几斤，最多差不过二三两，别人也不计较。杀完年猪，父亲还要请左邻右舍打一顿“猪宴”——吃一顿猪下水，陪乡亲们喝几杯苞谷酒，算是迎年酒。

腊月二十五要磨年豆腐。离家不远的地方有眼山泉水井，那水清澈透明，喝起来回甘。磨豆腐时，父亲挑一担山泉水泡上自家种的黄豆，待黄豆泡胀后，父亲便挽起袖子用石磨推，我家那盘石磨直径为一尺，一个人推它不轻不重，石磨推

豆花温度不高，转速慢，每转三圈只能填上八九粒黄豆，磨出的豆浆细腻味浓，点出来的豆花白嫩。父亲一手掌勺，往磨眼填豆，一手握磨把推磨，腰肢扭动如舞，两手非常协调，乳白色的豆浆顺磨沿流下落在木桶中，再把豆浆倒进铁锅，烧开后用酸菜水或石膏点豆花。这点豆花可有学问，同样多的黄豆，不同的人点出来的豆花并非一样多，母亲做豆腐是出了名的老手，左邻右舍磨豆腐都请她去点豆花。半个小时后，豆汁就变成了豆腐脑，将豆腐脑倒在豆盒内，上面盖上木板再压上石块，约莫一个多小时，一盒白亮亮的豆腐就做成了，母亲用刀把豆腐划成四方小块，小心翼翼用手托起放在竹篮里。正月来了客，熬上一锅豆腐粉丝炖猪肉，定叫客人大饱口福。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一些地方时兴包饺子，我们镇安小山村里却忙着做年糖。年糖是用苞谷和小麦芽做成的，隔壁的刘大妈就会做年糖。刘大妈那时四十来岁，体格高大健壮，有着男人一般的力气。三十晚上吃过年夜饭，嘴一抹，就直奔我家厨房，这时一块长方形的案板早已架好。“咔嚓咔嚓”，钉锤敲击糖饼的声音，清脆而悦耳。敲碎的糖块不大不小，每块二两左右，足见其身手不凡。这是第一道工序。灯光下，刘大妈那宽阔的额头泛着红

光。父亲打下手，将糖块放入锅。母亲在灶间烧火。刘大妈手握锅铲拌糖稀。炼糖块时，火候的把握很重要，过大，做出的糖焦苦，更视为不吉利；过小，糖稀水分重，那糖不脆，软绵不香，失去风味。刘大妈每每恰到好处，将爆米花往糖稀中一放，就在锅里反复搅拌，垒起一团，然后一双手倏然从滚烫的锅中拿起糖团，“啪”往糖箱里一掷，不偏不倚，正在中央。就着热腾腾的滚气，用刀使力滚压，接着提起无底的糖箱，开始盘条，是谓“条功”。不谙此道的，条就盘得宽窄不一，歪歪斜斜。而刘大妈盘的糖条宽窄均匀，长短一致，令人赞叹。趁糖条冷却时，她悠然自得地喝茶抽烟。顷顷，她一手按着糖条，一手操着锋利的菜刀，只听“嚓嚓嚓”，随着整齐律动的节奏声，案板上切出的糖片便堆积如山了，其刀功的整齐划一，令人叫绝。一片片大小相等、薄如蝉翼、晶莹剔透的年糖，溢满满屋的清香。

“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现如今也要办年，可比往日省事多了。市场上买肉要肥有肥，要精有精；各种豆制品花样繁多，各种年糕也风味各异，糖块更是精美绝伦，只要想买，都能大包小包地提回家。可是少了那目睹制作的幸福，少了那自己劳动的汗水，少了那大人孩子一起忙碌欢乐的氛围，那年味就自然淡了许多。

手越来越越大，个头越来越高，字也越来越方正。他们有的早已练出笔锋，并在书法艺术这一领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有的字迹还是小时候练字时的模样，稚嫩、可爱、朴拙，并在横竖撇捺间透出一二儿乡下人特有的土气和真诚。我的堂哥算是前者，而我则属于后者。

前几天突来兴致，给母亲写了一封手写的信，并邮寄给她，期望她读信时能获得一些小惊喜和小感动，不想她收到信的当天晚上，给我打视频狠狠奚落了我一顿，其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的丑字。“看看你堂哥的字，再看看你的！这都是我教的！”母亲在视频中一字一顿地说，说着还拿起纸笔给我示范。

手机那头的母亲一笔一画地写着字，写了几遍却都不大满意，好不容易写成了几个，又觉得摄像头对得不准，拍不出她想要的效果，父亲要来帮她，被她伸手阻拦：“别抢，别抢。”

我在手机的这头，听着母亲的声声“别抢”，心中觉得似有清泉流淌，满腹暖意。窗外皎洁如玉的月光一泓一泓流淌进来，遍室温馨。流淌在手机屏幕上的月色与母亲那千里之外又近在眼前的字迹交相辉映，彼此涂绘，共同纤细，共同温暖。

月色纤细温暖

郝壮壮

在我过四岁生日的时候，我拿起了笔，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妈妈，开始教我写字。妈妈没有读过几天书，只念到了小学五年级，不过在她的同龄人中，她已经算不错了，她那一辈人有很多是文盲，连一天书都没念过。母亲的字虽然没有笔锋，但较之于他们，显然还是好上许多。所以，在母亲的“写字课”上，除了我，还有叔叔伯伯以及左邻右舍的几个孩子。

我们每晚都要练习写字，来来去去写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字，似乎每晚都是前一晚的重复。但也不是说每一晚都无足轻重，印象不深，有些夜晚还是铭刻在了记忆中的，譬如每月的十五十六，或者其他有大月亮的夜晚。家乡气候干燥，雨水稀少，云霞亦少，天空与地面鲜有雾霭阻隔，所以月亮一出来，它皎洁的光便会毫无保留地洒在大地上。一时间，满世界都是银色的光，连我们的瞳孔都有月色洒了进来。这样的夜晚完全不需要拉灯泡，即便是大人在屋子里拉了灯，孩子们也更愿意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写字。

黄土高坡上的孩子们都是趴在石磨上写字的，也都是趴在石磨上长大的。随着月亮一次又一次次盈满并挂在夜空，他们

在我过四岁生日的时候，我拿起了笔，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妈妈，开始教我写字。妈妈没有读过几天书，只念到了小学五年级，不过在她的同龄人中，她已经算不错了，她那一辈人有很多是文盲，连一天书都没念过。母亲的字虽然没有笔锋，但较之于他们，显然还是好上许多。所以，在母亲的“写字课”上，除了我，还有叔叔伯伯以及左邻右舍的几个孩子。

我们每晚都要练习写字，来来去去写的也就是那么几个字，似乎每晚都是前一晚的重复。但也不是说每一晚都无足轻重，印象不深，有些夜晚还是铭刻在了记忆中的，譬如每月的十五十六，或者其他有大月亮的夜晚。家乡气候干燥，雨水稀少，云霞亦少，天空与地面鲜有雾霭阻隔，所以月亮一出来，它皎洁的光便会毫无保留地洒在大地上。一时间，满世界都是银色的光，连我们的瞳孔都有月色洒了进来。这样的夜晚完全不需要拉灯泡，即便是大人在屋子里拉了灯，孩子们也更愿意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写字。

黄土高坡上的孩子们都是趴在石磨上写字的，也都是趴在石磨上长大的。随着月亮一次又一次次盈满并挂在夜空，他们

商洛山

(总第2550期)